

张柏然 著

译学卮言



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柏然 著

译学卮言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译学卮言 / 张柏然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7-305-09712-6

I. ①译… II. ①张… III. ①翻译学—文集 IV.
①H0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3205 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 版 人 左 健

书 名 译学卮言
作 者 张柏然
责任编辑 蒋桂琴 编辑热线 025-83592655

照 排 南京紫藤制版印务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31 千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9712-6
定 价 35.00 元

发行热线 025-83685951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市场部)

-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所购
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代 序

手捧着面前即将付梓的书稿,激动的心情难以抑制住。一篇篇文章带着一种岁月的厚重感把我们带回了学生的时代,去重温当年张柏然老师对我们耳提面命、谆谆教诲的一幕幕情景。这本论文集集结了张师从教 46 年来的学术文章。顺着一篇篇珠玑之言阅读下去,我们仿佛看到了他在学术之路上留下的雪泥鸿爪,听到了他在书山间传来的空谷足音。

《庄子》将语言表达方式分为三种:“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张师将这本自选集取名为《译学卮言》,其中当有自谦之意。在学生们看来,这本自选集不仅仅是“和以天倪”的“卮言”,而且更包含了“寓言”和“重言”。论文集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宏观角度思考了中国翻译学的建设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国译学的紧迫性。这个问题是放置在共时性的中西维度和历史性的古今维度所构成的坐标轴之上的。张师力主中国翻译学的建立必须充分利用包含传统译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尽管需要立足于全球化的理论语境之中,但是翻译学科在建设过程中的本土性特征必须明确。这一部分并没有局限在宏观上讨论中国翻译学的构成和特质,而且还兼备了多维度的面向。其中有在美学层面上对翻译的反思,有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迪,也有对翻译研究的语言学理路的思考,不一而足。对中国译学建设的焦虑、紧迫及建言,证明了张师既是当代中国译学发展的见证者,也是中国当代译学的建构者。这一部分的系列文章在立足当下的同时又是对过去中国翻译学所走过的历程的回望,同时也是对翻译学科在中国的 future 发展的展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些文章是极具学理价值和学科意义的。所以,不妨称之为“重言”。

这本自选集的第二部分以为词典做的序言为主。这些序言凝结了张师对词典编纂的体会和期许。张师从事词典编纂工作近 30 年,所编纂的词典大都是鸿篇巨制。在编纂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依然培养了近 30 名的博士。编纂和教书齐头并进,作为学生的我们亲眼目睹了其中的甘苦,而这种甘苦只有

张师本人才有最真切的体认。这种体认寄寓在了他为自己主编的《新时代英汉大词典》所做序言的标题上面：“岁月熔金铸新词，斗觉霜毛一半加。”这两行诗虽然寄托了张师对从事冷坐板凳、埋头编纂这份“苦役”的感慨，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无怨无悔的豪迈气概。此外，像“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老枝发新芽，新桃换旧符”这样的标题寄寓了张师对同仁所取得的成果的赞赏以及感同身受般的认同，同时也体现了他对词典事业创新意识的重视。这些文章虽然都是短小的序言，但是却寄寓了张师的深情厚谊。于是，我们大可称之为“寓言”。由此，这部自选集虽然取名为《译学卮言》，但庄子的其他两种言说方式（即“重言”和“寓言”）也是整部自选集的言说方式，在我们阅读过程中不难察觉出来。

自选集的第三部分大多是为翻译作品或是他人的专著所做的序言。文章长短不一，但都是自己内心感受发自肺腑的自然流露，“卮言”的这一言说特点在这一部分表现得更加鲜明。其实，自选集前面两部分所选文章又何尝不属于“卮言”呢？尽管有的侧重于宏观上的思考，有的侧重于曲言寄托，但都是自然而然的真情表露。可见，庄子所提出的“重言”“寓言”和“卮言”这三种言说方式尽管在书中的各个部分被各有侧重地体现了出来，其实它们是融合在一起贯穿于整部自选集始终的。所以，以“卮言”取名只不过是将其作为代表而已。

2012年正逢张师70大寿，这部自选集的出版正逢其时，张门弟子敬题绝句一首以表祝贺：

翻译词典艺双馨，
寓重卮言情殷殷。
沧海壮志云帆挂，
极目万里心不泯。

张门众弟子谨识（刘华文执笔）

目 录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	001
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	007
翻译本体论的断想	016
当代翻译美学的反思	023
翻译学的建设:传统的定位与选择	026
发展中国的译学研究	037
全球化语境下的翻译理论研究	040
后殖民之后:翻译理论研究再思考 ——后殖民主义理论对翻译研究的启迪	043
西方现代翻译学学派的理论偏向	056
中国需要创建自己的翻译学派	067
翻译理论研究的新课题	078
建立中国特色翻译理论	086
试析翻译的语言学研究	094
中国译论:直面“浴火重生”	102
当下翻译理论研究的两个向度	106
中国传统翻译批评的超越性特征刍议	115
双语词典(编纂)学刍论	124
语料库与双语词典编纂	130
英语同义词识小 ——《简明英汉同/反义词四用词典》代序	137
《词典学词典》读后随想	142
立足实用 追求创新 ——从柯林斯系列英语词典看当代学习词典编写新实践	146
论翻译学词典的特征与释义原则	153

岁月熔金铸新词 斗觉霜毛一半加——《新时代英汉大词典》编者絮语	164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来——《史氏汉英翻译大词典》代序	168
从《牛津大学英语词典》谈起	170
老枝发新芽 新桃换旧符——《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代序	174
给世界打开一扇认知中国哲学的窗口——《汉英中国哲学辞典》代序	179
《牛津英汉双解词典》序	181
美国的郊外契诃夫——谈谈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	185
《大白鲨》译序	193
锐意创新 勇于探索	197
中国译学:传承与创新	200
汗水勤浇灌 译苑又一葩——《汉英翻译与跨语认知》代序	202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序	205
开辟当代译论系统优化之路	
——《融合与超越:走向翻译辩证系统论》评介	207
读者需求与外语辞书创新	210
《中国外语类辞书编纂出版30年(1978—2008):回顾与反思》序	214
语言·文化·词典——《简明美国/英国英语词典》代序	216
点滴忆念陈嘉老师	218

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

我国自有文字翻译以来的一千多年间,已基本形成了特有的译学思想与理论。本世纪 80 年代以前,在翻译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翻译标准的探讨,从严复的“信、达、雅”到钱钟书的“化境”说,都局限于对翻译导向的总体把握,而很少甚至不涉及翻译过程中具体的操作技巧。80 年代以来,大量介绍和吸收外国的译学理论,尤其是引进了西方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我国的译学理论从宏观描述转为微观研究,对翻译标准及操作过程中的各个步骤、各项具体问题进行了逐一讨论和研究。这其中除了从语言学理论角度审视原语与译语之外,还从符号学、文体学、美学等角度对翻译进行多学科研究。面对这样一个新形势,我们不禁要思索:中国能不能建立翻译学?能不能有自成体系的中国翻译学?

任何事物的运动都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特点,翻译亦然。揭示翻译过程中的运作规律与特点,并运用科学方法加以描述便是翻译学的主要任务。翻译涉及文本、译者、读者三大关系,融合了语言、文化、哲学思想、审美心理等多种因素,具有极其丰富的内涵,它是一门涉及多学科,具有多层面(理论、实践、本体、外位)的综合性科学。建立翻译学就是要运用语言学、文学语言学、文化学以及美学等学科理论对文本进行研究,并从心理学、美学、哲学等角度对译者、读者加以认识。从翻译实践中总结理论,再以理论为依据调节具体操作;从翻译本体纵观文化外围,再从文化外围透视翻译本体,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探讨。总而言之,翻译学就是系统地研究双语转换规律,通过描述翻译过程,总结出一定的原则、理论与模式,以解释和预测一切在翻译范畴之

^{*} 当初与姜秋霞同志联名发表。

内的现象,从而构建一套宏观结构框架加微观操作原则的翻译理论体系。在中国建立这样一个翻译理论体系是否可行呢?有人认为建立翻译学只是一个“迷梦”(劳陇,1996),是不可企及的目标。我们则认为这是完全可能,也可行的。应该说,我国的译学已经起步,已积累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尤其是近几十年来,翻译理论已日趋系统化,很多专著都有着自成体系的理论框架,如刘宓庆的《现代翻译理论》、张今的《文学翻译原理》、申丹的 *Literary Stylistics & Fictional Translation*、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柯平的《英汉与汉英翻译教程》等,已为构建译学的美学理论、批评原理、文体学理论和语符学理论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持翻译学是“迷梦”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在翻译这一语言符号系统的转换活动中,由于各种不同语言符号系统之间找不到共同的规律,两语之间的转换无法实现对等,因而无转换规律可循,翻译只是将原语思想转化为译语思想的思想转换过程,这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的创造性思维及主体调节机制,因而翻译不受客观规律支配,便不能成为科学。我们说这种论点否定了人类思维的共性,否定了语言的共性,也就否定了人类思想的交流。只看到同中之异,而未见异中有同,过于突出和强调事物存在的个体特性,忽略事物的共性及普遍规律,这无疑是主观片面的。语言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制约这一活动的客观规律有待于一步步探求,尤其因它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科学地进行总结与描述势必会羁绊丛生,但没有充分揭示客观规律并不等于不存在客观规律,事实上,概念的转换就是翻译过程中的一条规律。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循,都有理论可依,正如文学研究有文学理论,哲学有哲学思想体系,翻译也有其自成体系的特点与规律。文本的结构、译者的认识以及读者的接受,都有其特有的规律。建立翻译学就是要揭示所有与翻译活动有关的内在特性,并用科学的方法进行描述和研究。毫无疑问,任何学科的建立都有一个从模糊到清晰、从杂乱到系统化的过程,只要我们认定这一目标,翻译学的建立便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是终究能够实现的。

二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的立足点何在?

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立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

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的实际情况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无可厚非,也必不可少,借鉴外来译学理论能丰富和发展我国的译学,但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上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应该一方面吸取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同时要根据本国的语言特点,透视语言中所反映的文化精神,构建具有本国特点的译学理论。纵观一千多年来的中国翻译理论,我们有着自成体系的译学思想,无论是“信、达、雅”还是“形似、神似”之说,都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整体思维方式以及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审美思想,这是中国译学理论发展的基石,我们要在此基础上,兼收并蓄,构建符合我国语言文化特点的翻译理论模式与操作系统。有种观点认为:中国译学发展的方向就是与国际接轨,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王宁,1996)何谓“与国际接轨”?与国际接轨不是要我们抛弃自己一千多年的译学思想,一味追逐他人的理论模式。而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必须要有一套建立在自身语言特点基础上的立足于本国文化精神的理论体系。

在宏观层面上,翻译学是对翻译客体-原语与译语、翻译主体-译者,以及接受者-读者三者本质特征的认识与研究。首先就翻译的基础要素语言而言,语言具有民族特点,因而各个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有很大的不同。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对两种语言进行对比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的译学理论更应从汉语的语言特点出发,通过与外国语言的对比描述确定相应的理论依据。在这一点上,有学者已构建了一个译学理论模式(刘宓庆,1989),即重描写的语义-功能模式。这一模式是以汉语结构特征为基础,通过与西欧语言的对比确立的。汉语与西语有着差别很大的形态表现方式,如汉语以“意合”为主,西语主要体现在“形合”上,这样两种不同的形态特征,决定了双语间的转换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语义功能的对应,而不是符号系统的形式对等。由于汉语缺乏语法功能的形态表现手段,以意念作为句子的连贯纽带,以“神”驭“形”,在双语转换中,要注重在整体上把握语言的内在意念发展。译学理论要相应地突出和强调对语言事实从宏观到微观的描写,从整体到局部的把握与分析。另一方面,对翻译主体译者的研究也要以民族文化背景为参照系,译者的思维、心理、情感等都脱离不了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影响,充分研究和对比不同的民族心理及意识过程,探求译者在翻译中的认识及其规律,从而确

立适合中国译者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中国译者的思维、认识及审美方式受中国哲学的影响,最大的特点是概念模糊性,具体体现在审美认识上就是:注意意象的表现形式,不太关注某一特定的意象表现形式的内在结构、成分分配及效果分析等,即注重宏观整体的接收,而不太关注微观透视。汉民族的“综合性”整体认知模式与英语民族的“分析性”思维模式形成强烈对比,这一反差反映在译者的认识上就会有对文本客体的审美整体性与逻辑性的反应。中国传统美学是以“天人合一”为哲学基础的,本民族的审美方式以知觉、体悟为主要特点;西方美学则是以“物我两分”为其始发点,辅之以逻辑辩证思维,与西欧民族的认识与审美方式相比,汉民族具有较少的认知性、思辨性和逻辑性。在描写译者的认识规律时,不可忽视其民族心理、文化背景及审美特点,应探寻与之相应的认知规律,指导具体的翻译实践。(张思洁、张柏然,1996)东方的葛洪说过:“文贵丰赡,何必称善如一口乎?”西方的荷尔德林也说过:“只能有唯一的一,这怪念头从何而来?何必一切须统一于一?”不同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毕竟是客观存在的。中西方译学的侧重实难免偏于一隅,两者所持的批评尺度很难兼得。真正融合这二者,只是历史老人的任务。但未来的融合或许正存在于今天各自的不断发展和繁荣之中。

研究翻译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即读者的接受心理。中国的译学也要包容中国读者的审美期待与接受取向,从以往曾做过的调查结果了解到(姜秋霞、张柏然,1996),读者的审美期待也有一定的特点,就语言形式而言,大多数中国读者都比较喜爱与外国作品原文结构较为贴近的译文。这种接受心理,也与整个民族文化的特征有着密切关系。中国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一种非凡的接纳和消融能力,善于接受异质的东西,物为我用。读者的接受取向及其所折射的文化背景也应纳入翻译学研究范围,因为译者在翻译实践中的动机与追求如何根据读者的接受特点进行调整具有一定的尺度与标准。

三

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科学化与人文性相结合。

只需回顾一下翻译史,我们不难看到,一部翻译史就是翻译研究方法迭相嬗变,不断另起炉灶的历史。这种现象的产生,一方面因为翻译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对翻译的内在的规律作抽象的、形式化的描写使翻译研究具有自

然科学的属性；另一方面因为翻译是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现象，对翻译的社会性、实践性和主体性的研究又使翻译研究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因此，要建立中国翻译学，必须坚持将两者统一起来。如前文所述，80年代以来，我国翻译研究中引进了许多西方现代翻译研究的术语和概念，大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领域，应该说，80年代以来的中国翻译研究在广度和深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形成了中国现代翻译研究史上的又一高峰。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翻译研究中一味分化，一味求细，带有繁琐哲学的味道，忽视了抽象与综合的倾向。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在追求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同时，一不小心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也丢掉了。翻译是语言的艺术。作为思维的载体和交际的工具，语言不是简单的机械，不是冷漠无情的单纯器具，而是充满了人情心绪、人世体验、人生阅历、人伦享受、人品精华、人性积淀的“思想精灵”，是蕴含着生机、灵气、活力、智慧的“生命编码”。甚至可以说，一个人的言语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知觉、生命的信号、生命的外化。如果无视于此，片面强调翻译研究的模式化、标准化，那实际上是把翻译研究简单化，把情感丰富、跳动着生命旋律的翻译活动变成干巴巴、冷冰冰、枯燥乏味、刻板生硬的“文字游戏场”，这是制造“人”“文”分离，使“文”外在于“人”，结果必定是背离了翻译研究的人文性，又有违于翻译研究科学化的初衷。当然，也须防止另一种片面性：那就是用翻译研究的人文性来否定翻译研究的科学化。不能因为翻译研究的人文性而认为翻译研究中的随意性、重复性、低效劳动是天然合理的，传统翻译研究的路子是至善至美的。那么，翻译研究的科学化和人文性能不能和谐地统一起来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这两者是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安共处的。

结 语

翻译学是一门涵盖译品、译者、读者三大关系，浓缩着社会、文化、心理等各个方面因素的综合性学科，有着复杂的层次、丰富的内涵和宽阔的领域。建立中国翻译学，就是要进行多角度、多学科的研究，结合中国传统的宏观描写理论与西方的微观分析理论，以中国语言、文化为基石，用科学的方法加人文观照对双语转换过程中的各个机制进行描述，找出客观规律与普遍性，确立语言翻译的科学依据和依归。

当然人类思维、人类语言以及人的认识与接受等都有共性的一面,唯其共同的特点使各民族思想感情交流成为可能,使语言翻译成为可能。这一共性也决定了翻译理论研究的共同方面。因此,我们既要立足本位,也要参照外位,既要注重共性,也不能忽视特性,构建以本国语言文化现实为依据,并能与国际学术界对话的中国翻译学。

(原载于《中国翻译》1997年第2期)

►参考文献

- [1] 劳陇.丢掉幻想,联系实践——揭破“翻译学”的迷梦.中国翻译,1996(2).
- [2] 姜秋霞,张柏然.是等值还是再创造?外语教学与研究,1996(4).
- [3] 刘宓庆.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中国翻译,1989(1).
- [4] 王宁.翻译研究的国际化之我见.文汇报书周报,1996-07-06.
- [5] 张思洁,张柏然.试从中西思维模式的差异论英汉两种语言的特点.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996(5).

中国传统译论的美学辨^{*}

中国的传统译论约始于 1700 多年前的佛家经书翻译。在我国的传统译论中,几乎所有的译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译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美学联姻。例如道安的“案本而传”、严复的“译事三难”、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入于化境”理论等,皆与我国的传统诗、文、书、画论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这些译论蕴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文论色彩和美学特点。这既是一种机缘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既须从这一历史文化的整体观照,又须从哲学-美学的特定视角来考察我国翻译史上的古哲时贤,才能真正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或是那样的译论主张,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提出的译论主张中潜在的哲学-美学的特色和内涵。本文着意从后者来考察传统译论与哲学-美学的渊源关系,简述我国传统译论中的美学思想及其所独具的特色。

一、我国古典美学是传统译论的沃土

传统翻译事业自汉、唐佛经翻译始,及至近代西方“新学”之翻译,再至当代的文学翻译至,可谓悠悠千载,译论接踵而出。若言其影响,当数道安之“案本而传”、严复之“译事三难”、傅雷之“神似”以及钱钟书的“化境”学说影响宏远。在传统诗、文、书、画各论及传统文化的孕育熏染之下,这些译论之间看似沟壑重重、难以兼容,然而,若悉心考察,各种译论大都渊源有本,其理论依据和其中包蕴的美学观点都根植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取诸于我国的古典文论和传统美学。

第一,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法句经序》)和道安的“案本而传”(《婆沙序》)是以道家的哲学-美学思想为其理论基石的。支谦在《法句经序》

^{*} 当初与张思洁同志联名发表。

中说道：

诸佛典皆在天竺。天竺言语，与汉异音……名物不同，传实不易……仆初嫌其辞不雅。维祇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

他首先指出由于“名物不同”因而“传实不易”；在“不易”的原则下，要求“实宜径达”“因循本旨”，且应以“当令易晓，勿失厥义”为善。其“不易”原则与道家的“无为”思想是一致的。

道家主张无为，崇尚见素抱朴。老子力主“无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庄子强调“不修”：“圣人之于德也，不修而物能离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庄子《田子方》）老子的“无为”和老庄的“不修”虽命名相异但含义相同。他们认为自然的本性是朴素，它自在无为，淡然无极，因此，提出了“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莫之为而常自然”（庄子《缮性》）这一哲学-美学命题。

在道家贤哲们看来，人不应该创造违反自然浑成的艺术，亦不应该在艺术创造过程中施以违反大道的小巧，因为大巧是道自身，是凡夫所无能表现的。是故老子曰：“大巧若拙，大辩若讷”（《老子》四十五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言不辩，辩言不善”（《老子》八十一章）。即一切均在不为而成；庄子亦说“天地有大善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庄子《知北游》）；只有“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他认为唯有朴素才是最真最美的。

支谦、道安正是因循道家“朴素无为”的美学主张，并且把它运用于佛教经文的翻译之中。支谦所说的“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和“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就是意指只要不失佛义，可不以文饰，即为善为美了。而且，他还直接引用老子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作为自己“因循本旨，不加文饰”的理论依据。道安更是“尽从实录，不令有损言游字”（《婆沙序》），兢兢于“本”，唯恐失实，因此对竺佛朔笔受诸经“穷校考定，务存典骨”，使之

“毫不可差”。(《出三藏记集》)这种做法表面看来是务本求实,而实则意在强调“无为”,批评时人以巧饰本,以文饰本,潜易原著精神的流弊。由此,他们的翻译理论隐现了道家“无为”“朴素”以及“常自然”的美学思想。

第二,傅雷的“神似”理论则脱胎于我国的艺术形神论。傅雷在《〈高老头〉重译本序》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神似”理论:“以效果而论,翻译应当像临画一样,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它包含了比“信、达、雅”三字标准更广泛、更深刻的内涵,并且把翻译纳入了文艺美学的范畴。

形神论最早是从哲学领域提出来的,是先秦与两汉哲学争论的焦点之一。《管子》的“精气说”可以说是形神论的雏形。《管子·内业》认为,人之生命乃精气与形气相合之故,实乃“神”“形”的统一体。《淮南子》继承了《管子》的“神”为精气的理论,明确提出“以神使形”即“君形”的美学主张,奠定了艺术形神论的理论基础。《淮南子》强调“神”对“形”的主宰作用:“神贵于形也,故神制则形从,形胜则神穷。”(《淮南子·诠言训》)并把神贵于形,以神制形的观点运用到艺术领域,认为“画西施之面,美而不可悦,规孟贲之目,大而不可畏,君形亡焉”。(《淮南子·说山训》)东晋顾恺之在绘画领域主张“以形写神”,体现在写人贵在写神。“顾长康(即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阙少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晋书·顾恺之传》)画物亦应有神韵。在他的自述《画云台山记》中,他说画积岗要“使望之蓬蓬然凝而上”,画丹崖临涧,“当使和赫赫崇隆,画险绝之势”。形神论者认为,艺术必须重“神”,才能使人产生美感。只注意表现创作对象的外表形体,忽视内在精神,则不能产生艺术的审美效应。形神论中“神”重于“形”,由此可见一斑。傅雷自己对“神似”的看法是这样的:

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结构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信仰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以甲国文字传达乙国文字所包涵的那些特点,必须像伯乐相马,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而即使最优秀的译文,其韵味较之原文仍不免过或不及。翻译时只能尽量缩短这个距离,过则求其勿太过,不及则求其勿过于不及。(《〈高老头〉重译本序》)

文中用了11个“不同”意在说明原文与译文之间在语言文字、思维方式和审美意识等方面存在着天壤之别。正是由于这些诸多差异,从而要求译者注重“神似”,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傅雷的“神似”与严复的“信达雅”并不相悖,而是对它的发展。这么多的差异,在傅雷看来,严氏的“信达雅”似乎过于简单,且似有“隔靴搔痒”之嫌。因此译者须从语言、美学等方面加以把握。他在《致林以亮论翻译书》中写道:

其次是民族的 mentality 相差太远。外文都是分析的、散文的,中文却是综合的、诗的。这两个不同的美学原则使双方的词汇不容易凑合。本来任何译文总是在“过与不及”两个极端中荡来荡去,而在中文为尤甚。

为了做到“神似”,傅雷主张译者应从艺术修养上下工夫。在《致罗新璋论翻译书》中傅雷的论述颇为精当透彻:

总之,译事虽近舌人,要以艺术修养为根本;无敏感之心灵,无热烈之同情,无适当之鉴赏能力,无相当之社会经验,无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势难彻底理解原作,即或理解,亦未必能深切领悟。

傅雷早年曾在巴黎研习艺术史而后从文。他把翻译比作临画,强调翻译“所求的不在形似而在神似”,要“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内而忘其外”。语中所及“神”“精”“内”盖指原文的意义与精神;“形”“粗”“外”是指译文的流畅与完整。因此,他的神似说一方面反映了我国传统文论画论中以神为“君”为美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他把这种思想引入翻译领域,使翻译艺术融会于我国传统的文论画论的沃流之中。

第三,钱钟书根据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的一节训诂,以林纾的翻译为实例诠释了“译”“诱”“媒”“讹”“化”一脉相通、彼此呼应的意义,推导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翻译的最高任务是进入“化境”的结论。以一“化”字概括翻译的最高标准,可谓一字中的,凝练至极:

文学翻译的最高理想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为另一